

经济追求、相互依赖与德国 在 1914 年的战争决定

梅 然

内容提要 尽管经济需求常被视为推动德国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动因,但如果没有预防性战争需求,难言德国会迟早发动一场基于经济需求的大战;即便德国也无意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经济收益,这应该是附带和随机性的;那种认为经济需求可能使德国不顾及对外经济联系而选择大战的观点也不成立。预防性战争动机仍更可能是推动德国走向大战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 经济追求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战争的动因作为历史或理论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即将迎来一百周年之际,这场战争的根源仍是一个争论焦点。德国被认为应对大战的发生至少承担首要责任。德国为何在 1914 年促发了世界大战?经济需求常被列为德国迈向大战的一大动因。不可否认,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对外政策的背后有着明显的经济欲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强间的经济竞争对它们相互间的政治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德国人在 1890 年代后期推出和支持“世界政策”(Weltpolitik)的动机是多元的,但物质需求无疑是一大基本内容。尤其是德国被认为需要去获得市场、原料和投资机会方面的更多保障,并为它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更多的海外生存空间。除了在海外,德国也在欧洲谋求扩大经济势力范围,中东欧地区成为了它的重点目标。在该背景下,经济追求动机在第一次

* 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世界大战前德国对外政策中频频显现。德国的很多工业家和金融家支持在全球范围内用“进攻性方式”去推行帝国主义扩张。但是,在今天的国际学术界中,经济需求在德国战争决策中的重要性遭到了普遍质疑。这种认识大体是成立的,但在系统性和细节上尚存问题。本文不是要推翻这一主流看法,而是提供一个更有条理的支持性论证。它既试图涵盖现有研究,也谋求实现在某些论点上的更好综合和一定推展,从而给予一个相对更好的阐释。尤其是,它要回答:经济需求是否是和预防性战争考虑并立的充分开战动机?换言之,即便没有预防性战争需求,德国是否也会迟早发动一场基于经济需求的大战?给出的答案将是否定或质疑性的。^① 鉴于中国学术界仍趋于强调经济需求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对于推动对该传统认识的反思或许也有其价值。

一、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战争动机的学术争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仍是当代历史学家和理论家高度关注的问题。比如,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指出,1914年的事件仍是对关于现代战争起源的理论的一个关键验证;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分析最多也最具争议的案例,它看似为几乎每个理论解释提供了某些经验支持。^② 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的关注中,1871—1914年尤其是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由于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重要关系,一直是焦点所在。相关的历史著作汗牛充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为核心案例的理论研究也比比皆是。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言,“所有试图解释‘自挫式扩张主义’的理论都必须首先从研究德国这个典型案例出发”。^③ 随着20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一百周年的走近,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前德国的研究成果很可能有一个新的涌现高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战胜国一致认为,德国应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承担主要或全部罪责。关于“战争罪责”的《凡尔赛条约》第231款称,战胜国确

^① 鉴于作者的德文能力和获取德文著述的不便,本文大体基于英文参考文献。虽然欧美英语国家对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关系有着悠久和高水平的研究,英文文献(不少是由来自德语国家的研究者所撰)也大体是该领域研究著述的主体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文文献中的重要观点,没能利用德文文献仍是本文的缺憾。

^② David Stevenson, “Militarization and Diplomacy in Europe before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1997, p. 125; Dale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6. 关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起源的研究为何一直受到关注,参见:Roger Chickering, “The Enduring Charm of the Great War: Some Reflections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Sven Müller and Cornelius Torp, eds., *Imperial Germany Revisited: Continuing Debates and New Perspectives*,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1。

^③ [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认而德国也接受德国及其盟国给战胜国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和破坏的责任,它们是德国及其盟国所强加的侵略的结果。德国政府虽然被迫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实则拒绝接受它对德国的战争责任指控,并在此后多年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图颠覆之。比如,它在外交部下建立了一个“战争罪责司”专门领导该工作;在1922—1927年间,它公布了多达40卷但经过挑选和剪裁的战前外交档案;它对内打压与官方观点对立的声音和人士,对外则大力资助对德国有利的“独立研究”并推广某些著作。^① 德国政府竭力向世人灌输如下看法:当初是协约国方面在谋求扩张并发动战争,面临敌人包围和侵略的德国只是被动和防御性地应战;即便不能说某一个国家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德国肯定是责任最小或无责任的。与此相关,随着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关系的更多反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十年的世界中——包括在英语国家中,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原因及其战争责任问题的如下主流观点形成了:列强是在事先均无明确开战欲望的背景下由于秘密外交、同盟体系、动员时间表、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物质贪欲等因素的刺激,由于错误认知、误算、过度反应和失控而“滑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并不需要比其他大国承担更多罪责,甚至其他国家负有更大责任。^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未颠覆上述认识的主导地位,即便德国被普遍视作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普遍的看法(尤其在德国)是:纳粹德国的产生及其侵略主要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治建构的失败、《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民族情绪的刺激、大萧条和希特勒的发迹,只是德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事故性变异。路易吉·阿尔贝蒂尼(Luigi Albertini)的多卷本巨著《1914年战争的起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首部权威性著作。虽就史料的运用和观点的拓展而言,它是划时代的,但也未明示是德国蓄意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③

但从1960年代起,上述观点遭到了强有力批驳。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堪称首要代表。其代表作是《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和《虚幻的战争:1911—1914年的德国政策》。^④ 根

① 对此,最细致的研究是:Holger Herwig, "Clio Deceived: Patriotic Self-Censorship in Germany After the Great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2, 1987.

②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著述而言,该观点的代表作首推:Sidney Fay,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Vols. 1-2, New York: Macmillan, 1928。该书认为奥匈和俄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负有更大责任。

③ Luigi 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Vols. 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1957.

④ Fritz Fischer, *Griff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 Düsseldorf: Droste, 1961; *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 bis 1914*, Düsseldorf: Droste, 1969。前书的英文和中文版分别是:Fritz Fisch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Norton, 1967; [德]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后书令人遗憾地至今仍无中文版,其英文版是: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New York: Norton, 1975。

据前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蓄意发动的,德国对其发生应负首要责任;“世界政策”之类的对世界性权力的帝国主义追求主导着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并推动它启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廉二世德国和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同样性质,都是出于统治阶层或权力精英的扩张性欲望,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延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已在跃跃欲试地实施吞并和种族迫害。后书则对前书中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将维护传统政治秩序的国内政治需要强调为德国统治者推行扩张性政策并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动机,或者说强调了国内政治因素对于德国对外政策的主导作用:在快速的工业化和社会变迁的同时,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秩序仍大体停留在传统的保守主义框架内;在统治阶层看来,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中坚的左翼力量的发展构成了对传统政体不断增长而又难以遏制的威胁;为了应对该威胁,德国的当权者企图通过推行扩张性政策或霸权政策,以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和强化对传统政体的国内支持;他们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将民众的注意力外引到能激发民族主义热情的对外战争上和促进国内团结,从而维护传统政体。费舍尔并不认为德国在 1914 年的战争决定是出于单一动机。他强调,对不断上升的俄国力量的担忧,以及与此相关的预防性战争思维也增加了大战对于德国决策者的吸引力。他们的目的“是企图在敌人变得过于强大前击败他们,并实现德国的政治雄心,概言之即德国在欧洲的霸权”。^① 其实,与费舍尔的核心观点类似的想法此前一直存在。^② 但是,作为依托新史料更有力地论证这些观点的专著,《争雄世界》和《虚幻的战争》仍在德国现代史研究领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争议,因而有着里程碑意义。费舍尔及其支持者也形成了一个“费舍尔学派”(由于费舍尔来自汉堡大学,也常被称为“汉堡学派”)。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弗克尔·伯格哈恩(Volker Berghahn)和伊曼努尔·盖斯(Immanuel Geiss)也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③

自 1960 年代起,费舍尔学派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成为关于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

① 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p. 470.

② 比如,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该书强调,德国对欧洲霸权的追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决定性动因。从维护国内现存政治秩序角度论证德国对外政策的先驱之作则是: Eckart Kehr, *Schlachtflo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Berlin: Ebering, 1930; “Anglophobia and Weltpolitik,” in Gordon Craig, ed., *Economic Interest, Militarism and Foreign Policy: Essays on German History*, translated by Grete Heinz,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③ [德]汉斯-乌尔里希·维勒:《德意志帝国》,邢来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Volker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1973; Im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London: Routledge, 1976。

战起源关系学术辩论的一大起点和参照。^① 费舍尔认为是德国蓄意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一观点至今并未得到普遍接受。不过,当前多数学者们也不认为,德国最初是在没有任何战争意图的情况下滑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流观点认为,在1914年的7月危机中,德国的主要决策者——首相和皇帝(军方的态度与他们有所不同)——是想打一场奥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虽然他们认识到该战争可能引发列强间大战,但他们支持奥塞战争不是为了促成大战,而是认为,相比于风险更大的大战,这样的一场局部战争更值得欢迎。另外,他们对大战虽谈不上期待但也来者不拒,或者说抱以纵容态度:他们明白奥塞战争可能引发大战,但不打算刻意回避大战风险和拒绝奥塞战争,有意在大战难以避免时接受其到来,但要争取让俄国在舆论上成为大战开启的首要责任者,并让英国保持中立。这样,德国仍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负最大责任。^②

无论德国人是蓄意发动大战,还是纵容其发生,他们对大战至少体现了某种接受。那么,他们接受大战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基于相关论述(包括费舍尔学派的基本观点),下面三项或其中之一二被广泛视为德国领导层在1914年选择大战的主要动机:(1)通过战争获得与德国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甚至霸权,包括满足国内对市场、原料和投资机会等经济资源的更多追求;(2)利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和谋求国内政治团结,从而维护保守政体;(3)鉴于对手尤其是俄国的军事力量的快速上升,在德国数年后愈发难以应对一场大战之前,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应对战略处境的被动化。

有关这些动机在当时德国战争决策中的重要性,争议一直存在。对国内政治动因的强调堪称费舍尔学派的核心观点,但也一直饱受质疑,以至于在今天难言得

^①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和围绕费舍尔学派的辩论,除去前注所提及的三个文献,近30年来,从总体上阐述性的重要著作另有:Hannsjoachim Koch, e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German War Aims*, London: Macmillan, 1984; Robert Evans and Hartmut von Strandmann, eds.,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hn Langdon, *July 1914: The Long Debate, 1918-1990*, New York: Berg, 1991; Keith Wilson, ed., *Decisions for War, 1914*,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Press, 1995;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nika Mombauer,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ontroversies and Consensus*, London: Longman, 2002; Richard Hamilton and Holger Herwig, eds.,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Berg, 2004; Jay Winter and Antoine Prost, *The Great War in History: Debates and Controversies, 1914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mes Jolland and Gordon Marte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2007; Holger Aflebach and David Stevenson, eds., *An Improbable War?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nd European Political Culture before 1914*,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7; William Mulligan,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持该观点的著述甚多。其中,对七月危机中德方对各项基本选择(包括奥塞战争和大战)的偏好程度给出了较清晰排序的代表性文章为:Jack Levy, "Preferences, Constraints, and Choices in July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1990-1991。

到了广泛应和。^① 反对者指出,无论从史料还是政治思维逻辑的角度,都难以很好地证明,国内政治需要在1914年夏天对德国决策层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难言它在先前岁月中对德国对外政策也是那么重要。^② 以杰夫·埃利(Geoff Eley)、戴维·布莱克伯恩(David Blackburn)和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费舍尔等人夸大了统治阶层对德国政治现代化的阻碍。他们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多元化、民主化、进步与活力,强调统治精英内部的矛盾和他们对于社会变革的某种弹性,强调右翼民族主义的现代性、相对于统治阶层和政府的独立性及对后者的批判性,甚至觉得德国若未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能完成民主化。^③ 预防性战争动机则得到普遍认可,即便未被看成首要动机。毕竟,有大量来自德国决策层的言论可作为证据。^④ 鉴于扩张性动机或经济需求动机也受到了广泛质疑,预防性战争动机看似成为了上述三项动机中最有力者。

在德国的扩张性动机中,经济需求通常被视为核心所在。国家通过使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谋求对外部经济资源的控制,即所谓的“经济帝国主义”,常被用来解释德国为何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主要根源,将德国对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机会等经济资源的争夺作为它在1914年挑起战火的主要动因。但在今天的国际学术界中,主流观点趋于质疑或否定经济需求对于德国迈向大战的强大作用。马克·休伊森(Mark Hewitson)总结说,“自1980年代以来,曾受到费舍尔影响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淡化了工业家和金融家在德国对外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指出……自

① 费舍尔和维勒是该观点的首要代表,由此也形成了“特殊道路”学说。它认为,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英美法现代化道路的特殊轨道,即便在经历了工业化之后。它没有接受自由主义对其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的有力改造,长期保持着威权主义政体,甚至迈向了纳粹极权主义。而其首要原因是:以容克阶级为首的统治精英力求维护传统的保守政治秩序,为此他们运用镇压、笼络和推行民族主义对外政策等手段去应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

② David E. Kaiser,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5, No. 3, 1983; Edmund Clingan, *Finance from Kaiser to Führer: Budget Politics in Germany, 1912-1934*, Westport: Greenwood, 2001, pp. 20-21; Woodruff 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

③ Richard Evans, ed.,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Wilhelmine Germany*, London: Croom Helm, 1978; David Blackburn, *Class, Relig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Geoff Eley,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David Blackb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Geoff Eley,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Richard Evans,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Geoff Eley and James Retallack, eds., *Wilhelminism and Its Legacies: German Modernities, Imperialism, and the Meanings of Reform, 1890-19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关于德国当局对手尤其俄国的力量上升的忧惧及其对预防性战争的考虑,下列两本著作都有大量论述: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 Volker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身经济利益和资本的某种短缺使很多大企业倾向于国际协作和避免冲突”。^①但不无矛盾的是,持该观点的学者们看似并未提供较细致的相关论证。他们更多地关注外交、危机、军备、同盟、国内政治和民族主义等因素对德国的影响,虽然它们与经济需求总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但以后者为主要视角的细致研究仍显缺乏。表现之一是:自1970年代以来,在涉及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关系的著作中,基于经济需求的分析通常是最粗略的。^②难道在很多学者看来,一些基本论据已可证明德国战争决定后经济需求动机的乏力,该议题遂已不具吸引力?即便如此,既往的著述在系统性和细腻程度上仍明显差强人意,包括未回答或很好回答一些问题:比如,尽管如学者们广泛认为的,德国密切的对外经济联系使其看似不致于因经济需求而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又如何看待如某些学者提出的德国仍可能因经济需求而置对外经济联系于不顾的论点?如何看待该可能性:容克阶级出于笼络城市工商业阶级的国内政治需要,支持通过大战进行对外经济扩张?如何看待为经济需求而战对德国最高决策者的吸引力?

即便德国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是出于预防性战争需求,从理论上讲,该预防性战争可能也多少具有“经济预防性战争”的成分:相比于及时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在敌人准备充分时身陷大战也更可能使德国因战事不顺或战败而吞下更大的经济苦果。当然,不宜将德国领导层的预防性战争考虑看成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应该说,它要维护的首先仍是狭义或精神层面的国家安全目标,即德国作为一个中欧民族—政治单元的生存、自主和荣誉。但是,即便德国人的预防性战争全无经济上的预防性成分,也难以否认他们在战前可能认识到:包括预防性战争在内的任何战争都有可能带来经济好处(比如,借战胜之机对战败国“顺便”进行经济剥削)。因此,否认德国战争决定的背后有着经济动因(这正是某些学者的论断)是草率的;若要探讨经济需求与德国战争决定的关系,尤其是探讨经济需求本身是否足以“单独地”或“充分地”推动德国走向大战,更合理的核心问题应是:如果没有预防性战争需求,德国是否也会迟早发动一场基于经济需求的大战?若对此是质疑或否定的,就可相对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预防性战争考虑更可能是德国走向大战的首要或主要动因;即便德国也有意从大战中获得经济收益,这应该是附带和随机性质的。但是,质疑或否定经济需求动因的学者们似乎未曾明确地提出上述问题(即便可能有所意识),他们的论述也由此而多了一份模糊。

① 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22.

② 比如,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中只用了不到两页的篇幅去粗泛地否定经济动因对德国的进攻性政策的刺激,参见[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第75—76页。在近年涌现的著述中,对经济需求因素着墨较多的是: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它有一章专门述及,但在力度和清晰度上仍不令人满意。

二、战争代价和经济预期

对于保护和拓展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战争手段有其适用空间。从理性角度讲,在考虑是否要为经济需求而选择战争时,当事人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鉴于随战争而来的代价和风险,是否值得这样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经营者或雇主们可大致分为四个相互间不无交融的群体:工业界、贸易界、金融界和农业界。相比较而言,前三者(后文合称为工商界)的经济活动有着更强的跨国性质,或者说体现了对于境外经济利益的更多需求。后者的核心是土地阶级或容克地主阶级——也可称为“贵族—农业精英层”,他们是普鲁士的传统统治阶级,在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中仍是政权的主要把持者,也是保守主义政治秩序的首要维护者。但是,他们以经营农业为主,其产品主要内销,他们的经济利益更多体现在国内。

即便这些群体力求实现自己的经济欲求,也难以很好地证明他们企图通过有多个大国卷入的欧陆大战或世界大战这样的极端手段去实现。这样的战争很可能是高代价和高风险的较长期消耗战,德国的军政领导人对此不无预见,他们并非像一些学者们先前所认为的那样相信未来战争是进攻占优局面下的速战速决。^①为支撑长期大战,德国很可能需要投入巨大的物质资源和付出高昂的人员牺牲;即便付出巨大,德国也未必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战败的德国很可能遭到对手的欺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德国总理的电气业巨头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在战前就言道:如果德国输掉了战争,对于由此而来的代价,“德国的哪一个阶层能够付出?农业界将不会付出很多,中间阶级也不会付出非常多,只有工业界将不得不付出。换言之,胜利者将成为我国工业的购买者,而我们将成为挣工资的奴隶”。^②而且,由于大战对业已十分密切的跨国经济关系的破坏,以及对物力和人力的巨大损耗,它可能引发德国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失衡,甚至导致革命,使德意志帝国在战争胜利的曙光未现之前就在内忧外困中崩溃;即便革命未在战时来临,如果德国战败,革命仍可能接踵而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力量的上升被容克阶级视为对自身统治地位的最大挑战,影响不断增加的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则被视为头号国内敌人;工商界领袖们在理念上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化或许有更多认可,对于容克阶级的权势也多

^① Stig Förster, “German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the Images of Future Warfare:1871-1914,” in Manfred Boemeke,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örster, eds., *Anticipating Total War: The Germ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Holger Herwig, “Germany and the ‘Short-War’ Illusion: 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6, No. 3, 2002.

^② 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31.

有不满,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同样存在对社会主义的明显恐惧,他们愿意与容克阶级合作和维持传统秩序。与此相关,无论在容克阶级还是在工商界中,大战的国内风险常被提及。比如,从总参谋长岗位上退休后的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在1909年撰文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生存有赖于其贸易和工业的正常进行时,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当数百万人的生存需要数十亿开销时,消耗战略不可行。而且,它可能引发国内的红色革命。^①从1909年起任首相的泰奥伯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后文按通行习惯称贝特曼)也认为,大战不是加强政权合法性的合理途径。“相反,结果难料的世界大战会极大地强化社会民主党的力量。”^②其前任伯恩哈特·冯·标洛(Bernhard von Bülow)甚至认为,不仅失败的战争可能导致王朝的垮台,胜利的战争也可能加剧而非解决问题:“历史向我们表明,每场大战之后都是一个自由主义时代,因为民众会要求补偿战争带来的牺牲和努力。”^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进程和结果来看,这场战争也的确堪称整个德国的灾难。^④

鉴于大战的潜在代价和风险,经济需求使德国意欲发动大战的观点令人生疑。德国人并不排斥用战争手段去追求经济利益,只要战争的代价和风险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即便战争对象是一个大国。比如,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应对美国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对德国的经济威胁,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制定了对美国的战争计划,主要包括打击美国的海上运输和攻击美国沿岸。^⑤德国与美国之间的一对一战争是该计划设想的一大场景。在这种不波及欧洲本土、没有其他大国卷入、规模有限且毋须大量动用德国陆军的战争中,战争的代价和风险对德国是较低和容易应对的。但是,一场欧洲大战或世界大战的代价和风险不可同日而语。

对战争的代价和风险的估判并非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因经济需求而诉诸战争的唯一要素,另一要素是对于和平状态下经济前景的预期。如果鉴于和平状态下的经济收益,维持和平看似强于动武,即便战争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它在经济上也没有多少吸引力。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经济状况或德国人对和平状态下经济前景的预期,说他们为了经济需要而意欲发动大战也缺乏可信度。在第一次世

① Manfred Boemeke, et al., eds., *Anticipating Total War: The Germ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1871-1914*, pp. 359-360.

② Christopher Bartlett, *Peace, War, and the European Powers, 1814-1914*,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p. 171.

③ David E. Kaiser,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 455-456.

④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人口状况和大众生活水准的破坏性影响,参见:Jay Winter, "Some Paradox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Richard Wall and Jay Winter, eds., *The Upheaval of War: Family, Work and Welfare in Europe, 1914-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⑤ Holger Herwig, *The Politics of Fru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German Naval Planning, 1889-1941*,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Peter Overlack, "German War Plans in the Pacific, 1900-1914," *The Historian*, Vol. 60, No. 3, 1998.

界大战前很长时间内,德国与美国堪称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迅猛的国家;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总体经济表现无疑最佳。比如,从1870—1913年,德国的国民产值增加了6倍,钢产量增加了15倍,煤炭产量增加了6倍,在一系列工业领域中(包括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出口增长率是欧洲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世界上仅次于加拿大和美国。^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中,德国经济增长的步伐虽然比先前有所下降,但仍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比如,从1907—1912年,德国的出口增长了31%,而进口只增长了22%。1913年,出口在191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0%左右。^②再比如,无论在当时的很多德国人还是后世的经济史家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两年中,德国经济正摆脱前几年的些许不景气:“在工业大国中,只有德国能够增加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它在化学工业——尤其是染料、电气产品和精密仪器方面获得了几乎是垄断性的地位,并在一些关键市场中包括在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将英国抛在身后。随着1911年后国内价格的上升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出口攻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对外贸易上的主要竞争者是英国,但就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而言,英国在德国的攻势下步步退缩。与此相关,以保守党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为首的派别主张通过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英国的经济地位,但这在支持自由贸易的强大势力反对下并未成功。英国仍在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对工业品进口实行零关税(德国对进口工业品的关税税率平均则是13%)。在1897年,就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而言,英国比德国高11%;但到了1913年,该数字降至6%。有研究指出,假如和平得以更久维持,德国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到1926年就会超过英国。^④原料供应是德国工业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也有所改善。比如,凭借大规模投资,1906年,德国人已在法国的主要铁矿石产地默尔特-摩泽尔控制了1/3的矿业资源;而到1910年,德国在诺曼底矿区则控制了3/4。德国人也与瑞典签订了关于矿石供应的长期合约,其中规定的价格要比世界市场价格低30%。^⑤在分配海外经济空间方面,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也不无重要收获。比如,1911年8月,德国与俄国签订了就波斯和巴格达铁路问题达成妥协的《圣彼得堡协定》;1914年,德国分别与法国和英国订立了关于土耳其的协定,使得在德国主导下修建巴格达铁路成

①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经济增长,参见 Volker Berghahn,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ics*,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4。

②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London: Croom Helm, 1978, p. 265; Stephen Lee,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99。

③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p. 229。

④ Hugh Neuberger and Houston Stokes, “The Anglo-German Trade Rivalry, 1887-1913: A Counterfactual Outcome and Its Implication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3, No. 2, 1979, pp. 188-189。

⑤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pp. 274-275。

为可能。1914年6月,德国还与英国订立了一个在土耳其划分经济势力范围的协定。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工业领域超过半数的国际卡特尔是在英德间达成的。^①

尤需强调的是,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与协约国国家即英法俄有着明显的政治猜忌和军事竞争,而且当时的欧洲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猜忌和竞争转变为世界大战的过程,但正如上述某些内容所反映的,战前德国与英法俄的经济关系体现了强劲的增长趋势。进出口贸易额占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00年是32%,到1913年增至40%,而与协约国国家的贸易占据了主要部分。到1913年,协约国国家在德国进出口中分别占到68.1%和60%的份额(德国的同盟国盟友所占比例分别是8.4%和12.2%,奥匈帝国只是德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1900—1913年间,英德贸易增长105%,法德贸易增长137%,俄德贸易增长12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0余年中,德国从铁矿石的净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占所需数量的30%。其中,从法国的铁矿石进口在1900—1913年间增加了60倍。英德两国当时互为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德国20%的原料和食品来自英帝国,德国在1913年的出口中有14.2%销往英国。^②在金融和投资领域,德国也与协约国国家有着明显的相互依赖。比如,德法间有着密切的投资关系:一方面,如前所述,德国在法国尤其在其工业领域有着大量投资;另一方面,从19世纪末开始,德国的快速经济增长、资本的短缺和较高的利率也吸引了大量法国资本进入德国。对于协约国之外的其他“潜在敌国”,德国也在扩张其经济影响。比如,虽然塞尔维亚被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匈帝国视为首要威胁,德国仍在塞尔维亚有不少投资,甚至向它出售武器(只是认为这尚不至于改变奥塞军力对比)。这些经济关系表明:和平时期跨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当时尚未受到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决定性制约;或者说,对于基于政治和军事考虑而强力干预跨国经济活动,当时的政府尚缺乏意愿和能力。

在上述背景下,认为经济追求将德国人推向大战的观点面临着重要挑战,因为和平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使其经济地位愈发增强。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鉴于德国的经济活力,如果和平得以更久维系,德国会自然成为欧洲的主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不少经济界人士就表达了对经济前景的乐观。比如,休伊森指出,在威廉二世时代的多数德国工业家和金融家看来,世纪之交后的年代是德国

① Peter Liberman, "Trading with the Enemy: Security and Relative Economic Gai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1, 1996, pp. 163-166.

② 这些数字引自:Paul Papayoanou,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ritain, Germany, and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eter Liberman, "Trading with the Enemy";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p. 229.

的一个繁荣时期。曾先后担任德意志银行董事和董事长的卡尔·海费里希(Karl Helfferich)信心满满地说:“其他国家看到了我们不断壮大的力量、我们迅速增加的人口、贸易和工业的扩张以及经济上的进取精神。对这些来说,没有什么任务看似过于宏大。”他在 1913 年还撰写了对该时期德国经济最好的一本评论:《德国的国民财富:1888—1913》。它认为,德国正处于其巅峰时代,其欣欣向荣程度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这本多少是为了庆祝威廉二世登基 25 周年而写的书虽然不无逢迎之嫌,但未超出工业家、商人、金融家和很多土地阶级成员的基本认识。^①钢铁业巨头胡戈·斯廷尼斯(Hugo Stinnes)在 1911 年指出,再经过几年的和平发展,德国就能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经济主宰。在费舍尔看来,大金融家、与威廉二世私交甚好的马克斯·瓦伯格(Max Warburg)是“积极对外政策的坚定信奉者”。但是,他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一周前向威廉二世表示,德国应对战争保持克制,因为它每年都变得更加强大。^②

三、德国面临的经济挑战

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面临着重要经济挑战。德国是一个国内自然资源储备谈不上丰富、国内市场也谈不上广阔的国家。虽然它在战前已攫取了不少殖民地(总面积大致有 250 万平方公里),但这些主要是位于非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就开发难度、与德国本土的距离和市场容量而言,远不能明显缓解德国人的经济需求。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大行其道,森严的经济壁垒随处可见。在此背景下,在德国一直存在着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某种不安,这首先体现在对外部市场和原料来源的关注上。伯格哈恩写道:“德国人在 1900 年左右是如何看待国际体系的未来变迁的?在一个现存的帝国尚未被彻底强化为密不透风的集团或者看似正处于因内部弱点而分崩离析的边缘的时代,一场关于未来数十年中国际地图面貌的辩论在德国展开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其中包括帝国首相伯恩哈特·冯·标洛,还有很多工业界的保守派预言,现存的殖民帝国将进一步转变为封闭的保护主义实体。这样,就北美和南美而言,他们认为门罗主义将得到更严格的执行,而该半球将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封闭开来。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帝国被认为将按照类似方向变化,加强其特惠关税制度,并消除外国首先是德国的竞争。”^③尽管如此,仍不易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经济界普遍担心,即便和平得以延续,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仍将成为现实并有

^① 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 24-25, 31.

^② Richard Hamilton and Holger Herwig, eds.,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p. 16.

^③ Volker Berghahn, *Quest for Economic Empire: European Strategies of German Big Busines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6, pp. 5-6.

巨大的风险。基于前文所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经济状况和经济界人士的态度,不易断定德国经济界对于和平状态下的经济前景有着普遍的不良预期。伯格哈恩的上述评判也有值得疑问之处:即便先前德国的迅速经济成长未让很多德国人在1900年左右有着乐观的经济预期,1900—1914年的经济增长是否仍未改变其判断?在同一本书中,伯格哈恩自己也不无矛盾地表示:“尽管19世纪晚期的国际变迁导致了殖民地的巩固,但这些帝国尚未如后来的情况那样,在理念上变得等同于市场完全对他国封闭的堡垒式集团。虽然有着在1870和1880年代席卷西欧的保护主义浪潮,自由贸易和外部市场准入的理念在1914年前仍强大得足以维持一个国际经济交换体系——只是在1918年后的未来30年中才被抛弃。直到那时,物品和人员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受阻碍。国际商业处于其高峰;而且,尽管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在1914年前在上升,它们彼此间一直是最好的顾客。”^①

德国人更现实的经济难题是在财政金融方面,主要体现为资本短缺、不低的税负、妨碍中央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法律和政治障碍(根据德国的法律,中央政府的收入只能主要依靠征收间接税,而扩展税源和增加税额都不免引发政治纷争),以及国债的较高水准和贬值问题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元的,它们自身也在相互作用。比如,扩充陆海军导致需要大幅增加政府开支,但直接税收入的缺乏使中央政府趋于增加间接税和发行国债,而由此而来的对财富的吸纳和利率的上升又会减少资本存量(快速工业化刺激的国内投资本就加大了资本的短缺),国债的增加、扩张性的货币供应和对政府财政状况的不无担忧又多少推动了国债的贬值。这些问题的影响也是多元的,包括妨碍了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比如,与资本输出的乏力有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的对外投资额大致只是英国的三分之一,并主要集中于欧洲。德国的资本输出在1890—1913年间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英国的数字则是4.6%。^②针对资本丰裕的法国,标洛不无羡慕地说:“法国未见衰微的巨大影响及其牢固威望,不仅是其军事力量甚至也不仅是其文化和语言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丰富资本及其流通能力的产物。这是法国在西班牙、意大利、俄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有影响的主要原因。”^③

但是,仍有理由认为:这些问题尚不足以恶化德国人的经济预期,并使他们主

① Volker Berghahn, *Quest for Economic Empire: European Strategies of German Big Busines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4-5.

② Niall Ferguson, “Max Warburg and German Politics: The Limits of Financial Power in Wilhelmine Germany,” in Geoff Eley and James Retallack, eds., *Wilhelminism and Its Legacies: German Modernities, Imperialism, and the Meanings of Reform, 1890-1930*.

③ David E. Kaiser,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455.

要为了经济需求而决定承受大战的代价和风险。

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那么严重,包括与其他欧洲大国相比。比如,德国的公共开支占净国民产值的比例在 1891 年是 14%,在 1913 年是 18%,按现今标准并不算高。公共债务占净国民产值的比例从 1890 年的 50% 增至 1913 年的 63% 左右,该比例谈不上是债务危机。在 1914 年,就人均税负而言,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数字分别是 47.77、75.18 和 83.25 马克;就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德国与法国类似但低于俄国;就国债的回报率而言,这三个国家在伯仲之间。就国债占净国民产值的比例而言,德国、法国和俄国在 1913 年的数字分别是 44.4%、86.5% 和 47.3%。虽然军事开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中的迅速上升确实明显加重了德国人的税负,但在 1913—1914 年,就军事开支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而言,德国的数字是 3.5%,低于法国的 3.9% 和俄国的 4.6%;就人均军事开支和军事开支占中央政府公共开支的比例而言,德国的数字都低于法国和英国。资本短缺虽仍明显存在甚至有所加剧,但远谈不上令人绝望。资本短缺固然限制了德国的对外经济扩张。但是,对外投资在德国投资中份额相对有限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资本短缺,不如说是德国工业产品在全球的较强竞争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国内工业投资的较高回报率。这也是大量外国资本进入德国的重要原因。而且,资本短缺也未严重迟滞德国对外投资的步伐:诱人的境外投资机会仍将大量德国资本从国内引向海外,或者说,德国国内的资本短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大量对外投资所致。与此相关,就对外投资总额而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与英法的差距并非那般显著:1914 年,德、法、英三国的对外投资分别约是 350 亿、400 亿和 750 亿马克。再者,德国对外投资可能有着更高或更稳定的收益率:德国的对外投资集中于欧洲及其周边地带(比如土耳其和北非),约 2/3 的投资是在有着较好回报的工业领域;英国的对外投资则在更大程度上位于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国对外投资的一半左右则用以购买政府债券,其回报率平均是 5%。另外,德国的当权者们其实更在意资本短缺对国内经济而非对外投资的制约,甚至将对外投资责怪为加剧资本短缺的一大祸根。

第二,如前所述,对于德国的经济现状和前景,德国人体现了不少信心。“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在他们对于帝国的战略处境的评判中,威廉时代的商人、土地拥有者或官员将财经弱点——如果他们终究意识到其存在——置于了经济力量之上。”甚至,上述问题常被视作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和经济增长的健康体现(比如,资本短缺常被视作德国工业强劲发展的证明),或被认为有利于防止过度生产和经济危机。

第三,与上述相关,德国经济界人士更多地是主张通过经济手段应对上述问题,并认为战争手段可能给德国经济带来更多困难。比如,瓦伯格主张通过增收财产税之类的税收改革以增加政府收入,放松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以更多吸引外

资,其好友、航运巨头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则担心国际冲突将更多地导致资本从德国流向金融市场更发达的英国和法国。1907年9月,在德国“银行和银行业者中央协会”的年会上,瓦伯格还问道,德国是否做好了承受欧洲大战的财政后果的准备?他指出,这种战争将让德国每年付出220亿马克的代价(这比当时的多数估计都高,但仍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损耗)。^①

而且,德国的其他强项也会促进其经济扩张。除了在管理、组织、纪律和工作态度上的公认长处,德国当时在教育和科学方面也拥有令世人瞩目的优势。比如,在出版于1910年的科学著述中,40%左右是德语文献。德国的每个高等技术学校培养的工程毕业生在1913年比英国所有大学培养的都多。在19世纪末,德国的文盲率只有5%,而英国和法国的数字分别是前者的2倍和8倍。^②另一个有利于德国参与和平经济竞赛的因素是,德意志统一战争尤其是在普法战争中的辉煌胜利给德国在全球树立的军事威望。“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过后,普鲁士军事制度成为了世界上多数地区的钦羡对象。不仅欧洲和小亚细亚的,还有远至日本、中国、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各国政府转向普鲁士寻求军事训练顾问团和武器,并派送它们最好的基层军官去学习德意志战争方式。”法国在陆上战争领域原先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国家,如今“普鲁士军队首先挑战了几乎无处不在的对军事上的‘法国货’的尊崇……几乎一夜之间,德意志战争方式风行一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替代了约米尼成为了战争之神的使徒。从日本到智利,普鲁士—德国军事顾问团都是邀请对象。而随之而来的是普鲁士的火炮、步枪、军服、马鞍、马具、尖顶头盔甚至军乐器。”^③在此背景下,德国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而这也十分有助于扩展德国包括其经济空间在内的影响力。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南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军事学院和陆军都由德国人训练。德国外交部有高官评论说,“尽可能多的南美国家聘用德国军官作为教官的情况颇为重要,不仅是对于我们的军备工业,也对于在这些地区增进德国的存在和总体商业关系”。^④

① 该部分的论述主要根据: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 22-27; Niall Ferguson,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5, No. 3, 1992; “Max Warburg and German Politics.” 其中的引文和数字分别来自前两篇文献的第25页和第751页。

② Frank Tipton,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Culture: Germany in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Bulletin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Vol. 8, No. 1, 2006; Stephen Lee,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p. 93; Gordon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87.

③ William Sater and Holger Herwig, *The Grand Illusion: The Prussianization of the Chilean Arm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pp. 7-8.

④ *Ibid.*, pp. 7-8.

四、相互依赖问题

在德国人有着至少是正常的经济预期的前提下,不易相信他们为了经济需求而愿意承受大战的代价和风险。其中,战争对于对外经济联系的破坏应是经济界人士提及最多的。他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日益增长的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对于经济生活的潜在破坏力也在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已经达到较高程度。就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的某些重要指标而言,当代欧洲国家的对外经济依赖度并不明显高于 1914 年的水准,某些方面甚至更低。^①如前所述,德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置身于密切的对外经济纽带之中。在战前,认为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得战争愈发欠缺理性的看法也已随处可见。按休伊森的说法,当时的德国多数工业家和金融家都认为,跨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使维持和平更加重要,更倚赖国内市场的重工业界也大体如此。比如,代表重工业利益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盟”的主席、德国最大军工企业克虏伯公司的董事马克斯·罗特格尔(Max Rötger)强调:世界正处于沟通和交流的特征之下,德国是在自由交流和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取得了非凡成功和实现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它应保持经济交往的发展以最终实现工业化,这是德国屹立于强国之林的保证。该组织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进行和平的国际经济交往。比如,斯廷尼斯忙于在法国、俄国和英国等地收购企业,他还告诫右翼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联盟”的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ß)不要鼓动战争。“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德意志帝国最大的公司——克虏伯、蒂森、斯廷尼斯、德国电气、西门子、汉堡美利坚、劳埃德和德意志银行的有影响力的董事长和主人们,都势必失去国外的附属公司,他们的主要市场、原料和雇员的来源,并受损于对贸易的更大规模扰乱。所以,或许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在经历了 1914 年之前 20 年中史无前例的增长期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寻求避免一场国际冲突。”^②马丁·基钦(Martin Kitchen)也指出,德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企望让英国支持对外合资企业,对于海军造舰计划没有多少兴趣,不仅由于它对于现有的资金储备是一个长期消耗,也是由于他们迫切地要保持与伦敦市场的关系”。^③德国人也认识到,对外经济纽带的加强有助于抑制国家间的敌意和维护德国在境外的经济利益。在德国颇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柏林贸易协会”在大战前夕的 1914 年初还有如此表态:鉴于协约国和同盟国集团之间有着超越其对立的经济合作,以及各大国认为欧洲国家间的任何战争必然导致一场结果难料的世界大

^① Ralph Rotte, "Global Warfare, Economic Loss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Great War," *War in History*, Vol. 5, No. 4, 1998, pp. 489-491.

^② 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 32-34.

^③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p. 229.

战,和平可以得到最确凿保障,对于新的一年可有最令人安心的预测。^①

但是,围绕着经济相互依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至少有两种欠充分的主要解释认为出于经济需要,德国仍可能不顾及当前的对外经济联系而走向战争。第一种解释主要来自保罗·帕帕约安努(Paul Papayoanou)。^②他认为:对外经济联系能否防止国家走向战争,取决于要求维护该经济纽带的力量对决策是否具有重大影响。当时,德国工商界中主张避免战争以维护对外经济联系的群体(包括贸易界、金融界和出口型工业界)在决策层中缺乏影响,消极看待对外经济联系的力量则在决策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尽管德国有着密切的对外经济联系,但后一力量仍推动德国走向大战。该力量由两个群体组成:一是控制政权的容克地主阶级。他们本就没有密切的对外经济联系,而且一直主张对进口谷物实行高关税以保护他们所代表的农业集团利益。与此相关,他们宣称,对外经济依赖越大,德国就越容易受制于他国和难以独立自主。^③二是与容克阶级合作的重工业界。他们认为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也符合自身的经济利益,并对容克阶级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需求(比如,需要其合作以对外国工业品的输入构筑壁垒,并打压社会民主党等左翼力量),因而也支持推行该性质的经济政策。

但是,帕帕约安努的研究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它没有很好说明:容克阶级和重工业界确实是在争取实现经济自给自足,而非仅将它当成主要停留于理念层面甚至言不由衷的理想或宣传,或者并非那么广泛地认同它。假如他们确实是在争取实现经济自给自足或阻止德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扩大,而且如该论文所言对决策层影响最大,就很难理解前面提及的体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对外密切经济联系的数字(其中一些正引自该文):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为何德国的对外经济联系不仅未减弱,反而明显增强了?同样,也难以理解德国的世界政策。该政策既包括扩充海军和谋求独占性(从而顺应自给自足要求)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也包括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在此之外的海外贸易和投资。也有学者指出,对容克阶级主导的农业集团来说,他们所主张的经济自足不过是为掩盖或美化对自身私利(即保持谷物进口高关税)的追求而打出的意识形态幌子。^④

即便容克阶级由于其自身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自足有较强倾向,也难以断言重

① William Mulligan,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205.

② Paul Papayoanou,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③ 农业集团消极对待对外经济关系的原因不止于此。比如,对外投资会加剧国内的资本短缺进而抬高利率,这对于在资本市场上更多属于债务方的农业集团是不利的。须注意的是,农业集团所主张的高关税主要考虑了粮食生产者而非禽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甚至对后者不无损害(比如由于对进口饲料的高关税);而且,由于国内需求的不断上升和国内产出的相对有限,德国的农产品进口量和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度也在不断上升。另外,对农业集团的过度保护更多地是妨碍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德国经济的发展。参见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pp. 228, 245-248.

④ Ibid., p. 248.

工业界在这点上与前者有着明确共识。前文所引的重工业界人士的言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对外经济联系的存在和发展，重工业界不是积极反对，而是明显支持。容克阶级与重工业界的确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虽然容克阶级主导着国家政权，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界仍能通过包括议会政治在内的多种途径去影响国家的内外政策。重工业界希望得到国家政权的扶持，其中也包括利用关税等手段去限制外来竞争的要求。容克阶级则希望减少外来农产品对于国内农业市场的冲击，并寻求工业界的支持。鉴于德国的工业比农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农业界在关税问题上的需求其实强于工业界。对于打压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工业界和容克阶级则有着共同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工业界与容克阶级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或合作空间，德国出现了所谓的“团结政策”（*Sammlungspolitik*）。它旨在通过推动重要社会阶层的相互利益交换和妥协，以及对包括“民族利益”在内的共同价值的关注和追求，以弥合国内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抵御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长。该政策的起点和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推动重工业与容克阶级的合作（比如，既给予农业界在关税上的好处，同时又增加对重工业的支持），即缔结所谓的“钢铁与裸麦的联姻”，在俾斯麦谋划下通过的保护主义性质的 1879 年关税法案是该联盟出现的标志。后来的德国海军扩张则被广泛看作体现该联盟或团结政策的典型案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工业界用支持谷物高关税去换取农业界支持大笔的造舰订单，而且双方都希望这有利于将大众吸引到“民族事业”上。^①但是，尽管有着推动重工业界或工业界与容克阶级合作的意愿和举措，两者间的分歧仍是明显和持续的。工业界虽然总体上不主张推行民主制，但对于容克阶级控制政权和陆军仍心存芥蒂；两者在经济利益上的摩擦更是绵延不断（参见后文）。相比于农业集团，重工业界对国外经济资源的需求要高得多。这首先体现在原料供应上，但重工业产品在德国出口中的比重到 1913 年也已达到 22%。考虑到德国其他工业部门对国外市场有更大需求，而它们是重工业的下游产业，其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重工业的景气，德国的重工业对国外市场可以说有着更多的间接依赖。就此而言，认为德国重工业界将实现经济自足作为一个现实追求颇有疑问。

如下的说法或许更合理：经济自足对德国人来说确实是理想状态（对任何国家实都如此），但在对境外经济资源有大量需求而又难以实现自足的情况下，他们接受、容忍或乐见对外经济联系以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去成长。即便与多国为敌的大战或可帮助德国大力推进经济自足，但鉴于这种战争的代价和风险，帕帕约安努也未很好说明：为何容克阶级和重工业界主张用这样的极端方式去推行其经济主张？他认为，“这些群体对德国承受战争代价的能力有信心，而且觉得对英国

^① Eckart Kehr, “Anglophobia and Weltpolitik.”

的妥协政策仅是一厢情愿”。^① 该解释既过于粗略,也难以成立。

另外,在这篇论文中,帕帕约安努只是简单地指出容克阶级和重工业界的经济自主主张主导了德国的决策层,但没有具体说明:德国的主要决策者为何接受该主张?他们为何认为大战是实现它的合理手段?他也没有很好说明:为何主张维护对外经济联系的工商界力量(贸易界、金融界和出口型工业)对决策层的影响较弱?毕竟,这三者合起来是德国工商界中极其强大的一支力量,而且不少头面人物与政府和皇帝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他将德国工商界的各组成部分划分为不同阵营的标准也不尽明确合理。尤其是鉴于金融资本在当时德国经济体系中与重工业界极其密切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他没有很好说明:为何金融界和重工业界被认为持有明显对立的经济哲学?

第二种解释主要来自戴尔·科普兰,他认为,对外经济联系能否防止战争取决于当事国对对外经济联系的预期。即便当前的对外经济联系是密切和正常的,如果当事国不看好其前景,认为它可能出现停滞、萎缩甚至中断,它就可能认为发动战争比维持和平更有利于增进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多年的德国,人们已普遍认为,由于其他国家的打压等因素,德国对外经济联系的前景并不令人看好,暂时牺牲眼前的对外经济联系而诉诸战争才是保障德国经济利益的明智之举。^②

戴尔·科普兰的研究也存在着重要缺陷。它没有很好说明:是否当时德国国内对对外经济关系的前景确实普遍感到悲观?如前所述,有不少证据(一些正来自科普兰的论文)令人不易相信该悲观的普遍性。科普兰主要通过引用某些德国要人的评论,来证明该悲观的普遍存在。例如,工商界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民族自由党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曾说,德国必须寻求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区,以便保护其对原料的需求和出口。另一位来自民族自由党的政治家恩斯特·巴塞曼(Ernst Basserman)曾说,德国的贸易在某些地区日益下降,在这些地区正被排挤出或勉强维持。巴林曾说,德国在国外市场的扩展正日益受到威胁,尤其在石油丰富的近东地区。拉特瑙曾说,德国的原材料基础过于狭窄,它受世界市场的左右。连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格哈特·希尔德布兰德(Gerhard Hildebrand)都认为,获得殖民地已成为德国迫切的经济所需。但平心而言,这些言论远非明确得足以体现当事人对对外经济关系前景的总体悲观。而且,即便它们体现了当事人的悲观预期,它们是否足以体现德国人的主流认识(鉴于前述的乐观言论和其他证据)?尤其是,它们选自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个长时段,而非一个特定的短时期,而这十余年又恰是德国对外经济交往尤其是对

^① Paul Papayanou,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 71.

^②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外贸明显增长的时代。因此,它们是否足以体现德国人的普遍低预期更令人生疑。

戴尔·科普兰也未很好地说明:即便对外经济关系的前景不被看好,为什么大战会被视作保障经济利益的更合理方式?悲观预期导致的主战声音是如何左右到决策层的?既然——按照科普兰的表述——德国人的悲观预期在1900年前后就已出现,德国为何在1914年才走向大战,而不是在更早并对自己更有利的其他时间(比如日俄战争中)?萨拉热窝事件前夕,在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与外交大臣高特利布·冯·雅高夫(Gottlieb von Jagow)的一次对话中,后者反对前者的及早开战主张,并用德国经济状况正在改善作为理由。^①这似乎也表明:德国人在1914年的经济预期应该不像科普兰所言的那么糟糕;若单纯就经济预期而言,1914年的德国当局(至少其中某些重要成员)可能更倾向于维持和平。

五、工商界、农业界和决策层

在认为经济需求是德国迈向大战重要动因的著述中,费舍尔的《争雄世界》算是代表作。但是,该书其实只主要引用了两个言论来证明德国经济界有上述意图。一是德意志银行行长格奥格·西门子(George Siemens)在1900年的言论:“由于英德关系紧张,两国之间的战争太有可能性了,德国必须有自给自足地组织国民经济的手段”;二是北德意志银行行长马克斯·冯·申克尔(Max von Shinckel)在1905年的言论:“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冲突,有可能发生战争,德国必须手持利剑去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搏斗。”^②姑且不论这两位金融家是否足以代表整个德国经济界的声音,这两种言论的含糊措辞很难令人认为,当事人明确主张德国通过大战来捍卫其经济利益。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4年发生的,为什么费舍尔引用的言论却是1900年和1905年的?既然费舍尔“没找到”有力证据,这是否更表明德国经济界确实缺乏好战意识?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指出,试图证明德国经济界为了经济欲望而主张战争的前民主德国学者都未能提出有力证据。^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经济界,先前的论述似乎更多地论及了其中工商界人士对战争的态度。对于农业集团也须予以足够关注,尤其考虑到掌控德国政权的是作为该势力中坚的容克阶级。容克阶级的直接经济收益主要来自于国内农业市场。对外经济联系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经济利益相冲突:比如,在德

^① Imanuel Geiss,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German War Ai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1, No. 3, 1966, pp. 81-82.

^② [德]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第23页。

^③ Niall Ferguson,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735.

国工业品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上升的背景下,他国可能通过提高德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来迫使德国降低谷物关税;德国对外投资扩大所加剧的国内资本短缺可能推升国内利率,这对于在国内资本市场更多作为债方出现的德国农场主们显然不利。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城市工商业阶级力量的增长广泛视作对传统秩序和自身特权的挑战。当然,德国的对外经济扩张和工商业经营状况的提升对容克阶级也不无益处。比如,工商业繁荣有助于解决德国的财政金融问题,这包括既可以使容克阶级的税负得以减抑,又能给国库带来更多收入;对境外经济资源的更多控制有助于加强德国的经济自给自足;若官方支持工商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这也可能缓解工商界对容克阶级把持政权的抵触。费舍尔学派也强调,国内政治考虑推动着德国的当权者去奉行对外扩张。

但仍有重要疑问:即便容克阶级被上述利益所吸引,从而支持对外经济扩张,他们是否愿意为此而诉诸欧陆大战或世界大战这样的非常手段?似乎难以给出肯定回答。比如,前文已表明,财政金融问题本身不足以成为德国人寻求战争解决的重要动因;也难以断言容克阶级竭力阻止对外经济联系的扩大,对其前景普遍悲观,并为此而欲求走向大战。容克阶级对对外经济扩张的支持确有可能提升工商业界对于保守政治秩序在接受,但如同不少研究所指出的,该动机很可能没那么重要。尤其是,难以信服容克阶级愿意为了收买工商界而诉诸大战。如前所述,虽然德国存在着所谓的团结政策和铁麦联姻,但工商界与农业集团的对立仍是明显和持续的,后者在有利于前者的事务上采取冷淡或不合作态度的案例并不乏见。尤其是,德国对进口谷物实行的高关税既抬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从而使资方在工资问题上面临着更多压力,也招致了外国的报复性或对等性关税,从而限制了德国工业品的出口。再比如,对于开凿从莱茵地区到柏林的运河,与工商界的态度相左,容克阶级主导的农业界长期持消极立场,一大原因是担心运输的改善会降低进口谷物的价格。^①再比如,容克阶级对于大规模的造舰计划远谈不上热衷,很多人既不认为这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也担心由此而来的税收负担,多个海军法案是以宣传、政治压力和利益交换为背景才通过的。对于扩大由其控制的陆军对工商业阶级的开放度,容克阶级也明显消极。与此相关,工商界对容克阶级的不满随处可见。连与政府过往甚密的克虏伯公司董事罗特格尔都认为,主要代表容克阶级利

^① 从1900—1913年,德国工商交通领域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上升了22%,高于13%的工资增长额。参见 Stephen Lee,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p. 99。德国的重工业企业不得不较多地去压制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有的企业甚至自行养殖牲畜。为了在关税壁垒前尽力保证利润,除了争取来自国家的更多合同,德国重工业界还采取了如下做法:以自身的卡特化和对价格的操纵能力为依托,以较高的国内价格和较低的国外价格在国内外分别销售产品。但是,较低的国外售价虽然可能有助于德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占有和出口的增加,但未必带来利润的上升。参见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pp. 246, 265。

益的保守党如今已不符合工业界的需要。^① 于是,一个疑问自然生成:如果容克阶级在这些问题上都不那么愿意去讨工商界的欢心,又怎么理解他们愿意为了迎合后者而选择可能令其付出更高代价或承受更多风险的大战? 大战如果进行得颇为不顺或以失败告终,容克阶级不仅要承受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很可能遭遇令他们失去特权的国内政治革命。

对于陆军扩军的态度也可反映德国工商界和农业界对于战争的态度。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以法俄军力的上升为背景,扩军问题成为了德国政治中的一大焦点。可以说,工商界对于扩军比农业界更为积极。比如,对于为满足扩军需要而征收财产税,民族自由党比保守党更为通融;对于增加间接税(这对工商界多有消极影响,比如会提升产品价格进而抑制需求,会使工人阶级因生活支出的增加而要求加薪。由于农产品的课税范围远小于工业品,以及农业人口远少于城市人口,增加间接税所致的新增财政收入也会更多地来自城市阶级),民族自由党也较有弹性。工商界更愿意用军备竞赛去维持和平,而非迎接战争的来临。出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考虑,农业界或容克阶级对于扩军则保守得多,但这也折射出他们缺乏为了经济需要而打大战的欲求:否则,通过扩军而增加战争胜机岂不在情理之中? 先在税收上作出牺牲,再通过战争获得经济收益,这岂非先予后取?

关键是,无论工商界和农业集团是否本就期望用大战去满足经济需求,尚难证明的是:即便没有对预防性战争的考虑,德国决策层——皇帝、首相、阁僚和军方高层——也会策划一场基于经济需求的大战。没有多少有力证据能够表明这点。比如,标洛虽然是世界政策的主要炮制者之一,但也谈到了对大战的国内政治风险的担忧,也不认同大战的经济意义。他还担心,若更多的异族人口随着征服而被纳入德意志帝国,这会加剧德国的国内问题。他强调:“我们应该一直问自己从战争中期待得到什么。在欧洲的战争不可能对我们大有裨益。对于任何新的斯拉夫或法国领土的征服不会让我们得到任何东西(这固然有所夸张)。如果我们将小国吞并进帝国,将只会加强在德国从未缺少过的离心因素。”^② 贝特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表露过对大战的国内政治风险担忧,及对大战前景不确定性的失落,但未明确表露过对大战经济收益的希冀。而且,他在1912年后才表现出对于大战的某种认可,而这主要是出于对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的担忧。这表明,预防性战争考虑才是导致他对大战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再比如,前引的毛奇与雅高夫在萨拉热窝事件前夕的对话也表明,对经济形势的担忧不是推动军方和外交部门首脑选择大战的重要因素。至少,就德国在1914年的七月危机中走向大战的两个主要推动者贝特曼和毛奇而言,他们都未对为经济需要而发动大战表露多少兴趣。该

^① 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34.

^② David E. Kaiser,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 455-456.

兴趣也没有明显体现在威廉二世身上,没有很好的言论性证据说明这点。威廉二世在1914年前对于军方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请求多有拒绝,在七月危机的最后阶段也有避战念头,这也表明他对于大战(不论它是预防性战争还是经济帝国主义战争)缺乏至少是持续的热情。^① 费舍尔的著作对七月危机中德国高层的决策有长篇细述,但所引言论都不能证明经济需求在其中的影响。“费舍尔学派的论断的一大弱点是:没有精确地解释,要与斯拉夫人摊牌和咄咄逼人地保护贸易的言论,对于德国的政策有何直接影响。关于战争和风险评估的好战言论如何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是不清楚的。”^② 帕帕约阿努和科普兰的研究也未能证明这点。一些德国工商领袖的言行多少也表明,在决定迈向大战时,德国决策层难言征询了工商界的意见,或者说工商界领袖们对该决定知之甚少;斯廷尼斯与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际的通信表明,他们此时更关注于劳资关系问题;在德国对俄宣战前两天,拉特瑙还在对形势表示乐观;瓦伯格后来则说,当时“我们是在底层,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准备”。^③ 当代历史学家们普遍指出,从迄今了解的七月危机过程看,关于德国走向大战的经济解释十分乏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德国政府的确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夺取他国领土和经济资源的计划,在1914年9月提出的“九月纲领”即是一例(《争雄世界》对此有细述)。但这不等于说,即便没有预防性战争考虑,经济追求也会推动德国决策层走向大战。即便一国在战时提出了具有经济侵略性质的计划,这不等于该盘算在战前就是驱动它走向战争的主要动机。正如,一个罪犯在报复杀人时随手拿走了对方的财物,这不表明图财是他主要的初始犯罪动机。德国的领导人们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过或听过经济扩张设想,但结合前文,经济扩张难以定论为独立于预防性战争设想的充分开战动机,更可能是附加于前者的一个次要意图。如弗格森所言,“无须像费舍尔仍在做的那样,去断定旨在建立中欧和中非势力范围、摧毁法国的大国地位并瓜分俄国的西部帝国的德国战争计划事先就存在。证据远具说服力地指向了一场旨在为阻止德国军事地位恶化而先发制人的军事上的‘抢先打击’,虽然这与该想法绝非势不两立:这种打击——如果成功——的后果将是德国在欧洲的霸权”。^④

① 关于七月危机中德方的决策过程,《争雄世界》提供了一个详细叙述。一个按日期详述危机进程的很好著述是:David Fromkin, *Europe's Last Summer: Who Started the Great War in 1914?* New York: Knopf, 2005.

② David Keithly, "War Planning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14,"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12, No. 553, 1986, p. 563.

③ 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29.

④ Nial Ferguson,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734.

六、悲观论者和极右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虽然对和平状态下的经济前景有正常或良好预期者大有人在,但悲观或无把握者也不少,而战争手段对他们也不无吸引。比如,若干德国企业家在 1913 年告诉来访的意大利官员,对于确保来自法国的矿石供应,对法战争将仍是必要的。^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压抑德国人经济预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04 年订立的《德俄贸易协定》即将到期,而此后的德俄贸易前景及其影响令很多德国人担忧。在 1904 年的德俄贸易谈判中,出于既照顾国内农业集团利益但又不得罪工业界的考虑,德方既坚持对从俄方进口的农产品征收高关税,同时又要求俄方在关税上惠顾从德国进口的工业品。虽然俄方对此多有抵制,但德国利用日俄战争给俄国带来的困境对它大加施压,最终迫使它订立了一个堪称不平等的协定。该协定自 1906 年起实施,为期 12 年。德国人从中获益甚多,俄国人则是耿耿于怀。可以预想,在该协定到期前围绕后续协定的谈判中,俄国人肯定不会同意维持既有条款,而会要求德方以降低俄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去换取德国工业品在俄国的低关税待遇。鉴于此,德国人对该协定到期后德俄贸易的前景多有不安:农业界和工业界都担心新协定会以本方利益为代价;如果新协定难以达成,德俄之间则可能陷入一场贸易战,而对俄国市场有更多依赖的工业界将成为主要受害者。另外,即便德国工业界和农业界中某一方的利益在德俄贸易问题上得到了更多保护,受益方也不能不考虑另一方利益的受损对德国经济与政治形势的消极影响,比如,工业界经营状况的走弱是否会刺激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极右民族主义势力也是以战争手段去满足经济需求主张的主要来源。比如,身为将军的著名军事评论家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是极右翼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鼓吹德国要夺取市场和生存空间,而且要求为此不要将战争的发生推迟太久,这集中体现在他于 1911 年出版的著作《德国与下一次战争》中,该书也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最畅销的政论书籍。^② 极右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颇有声势,其代表性组织泛德意志联盟与德国的中上层有着广泛联系,比如其执行委员会中有着多位企业界领袖,工商界也是其外来资助的重要来源。^③

但是,这些仍不易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人对于和平状态下的经济前景普遍有着不良预期,而这与德国迈向大战有着密切关系。如前所述,不难找出数

①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pp. 269-270, 276.

② 该书英文版是:Friedrich von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13.

③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pp. 236-237.

量不菲的体现德国人良好预期的证据。对和平状态下经济前景有所担忧也不等于认可大战,后者可能造成更糟糕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巴林和瓦伯格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于经济民族主义也颇存忧虑,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倡导维持和平。由德俄贸易而起的担忧也难言必然转变为对大战的认可。不能说德国很难与俄国达成如下的一个妥协性协定:德方对俄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有所降低,俄方对德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则有所提高。这样的妥协既是德俄之间也是德国工业界与农业界之间的妥协。虽然1904年协定对俄国是不平等的,但由于德国工业品在质量和价格上的某种竞争优势,以及与此相关的俄方对于德国工业品业已形成的某种依赖,俄方利用工业品关税要挟德方也会有其限度(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何俄方长期维持了1904年的协定)。“戴维·卡勒奥(David Calleo)指出,德国与俄国和奥地利的片面的贸易协定1914年后不久就要终止,但这几乎不能改变德国对外经济状况大体上仍是积极的前景。”^①也无证据表明,在七月危机中,基于和平状态下俄德贸易前景的担忧对德国决策层的决定有着重要作用。在上述工业界人士与意大利人的谈话之外,也找不出多少体现工业界的战争倾向的言论。这些人士或许只是希望打一场德法战争,而非一场也将俄国甚至英国卷入的空前大战;而且,他们仍在争取与法国达成更有利的经济协定。

极右势力的社会影响力也不能表明,为保障经济空间而发动大战的观点在德国经济和政治精英中得到了广泛响应。除了前文的论证已表明该观点未广受认同,还可给出更多理由。极右群体的政治主张是庞杂的,并不局限于要求扩张德国的生存空间。打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犹太人和波兰人等少数族群也是其重要内容,甚至是重心所在。与此相关,很多人与极右翼交往或身处该阵营,更多地是由于他们认可国内问题上的右翼观点,而非由于他们赞同为了经济需求而发动大战。甚至,铁杆的极右分子也未必积极支持这样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极右思想的代表作《假如我是皇帝》就鲜明体现了这点,这是右翼代表人物、泛德意志联盟的主要领导人克拉斯在1913年出版的匿名作品。^②克拉斯在该书中主张推行包括战争在内的进攻性对外政策,但又认为:占据那些本由法国人或俄国人居住的领土未必有益,不应为了夺取国外领土并驱逐其原始居民而发动战争,东西向的扩张只应在最紧急时才予以考虑,以进攻性方式进行一场防御性战争——即在敌人发动攻击前先下手为强——则是合理之举。另外,很多人与极右翼交往并非由于高度认可后者的政治主张,而是出于其他方面比如公共关系上的考虑。比如,一些企业家担心公开排斥极右翼会不利于自身的经营活动。而且,虽然与极右翼交往或身为极右翼者大有人在,但更多的人是在疏远或抵制极右主张。休伊

① 转引自〔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第76页。

② 该书的一些摘选可见:<http://www.h-net.org/~german/gtext/kaiserreich/class.html>。

森指出,德国工商界人士对于极端民族主义其实有着广泛反感。与此相关,泛德意志联盟的一位干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在投身商界并成为克虏伯公司的高管后,还要求不要公开他与泛德意志联盟的密切联系。^①此外,也难以证明极右思潮主导了德国决策层。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德国决策层与极右翼有着明显分歧。^②威廉二世、首相和军方头面人物都不能说属于该群体,伯恩哈迪的主张在军政高层中也颇受质疑。在七月危机中发挥首要作用的贝特曼和毛奇都与极右翼都有明显距离,贝特曼还曾组织人马对伯恩哈迪进行声讨。

结 论

总之,关于德国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因的经济解释至少面临着有力质疑。德国人的确面临着经济挑战,他们推行的是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他们也希望拥有独占性或半独占性的经济势力范围,但没有足够依据证明他们主要是为了经济需求而走向大战。它们广泛持有下列认识:大战不仅不是增进自身经济利益的最佳手段,而且可能带来巨大损失。很多人最多只是有着对战争的某种意向,或希望战争在某种理想状态下来临,而非认为大战已经成为德国解决经济需求的不二选择。

前文所言的德国人的经济预期都是和平状态下的,即以和平得以延续为前提。但是,即便由于对和平时经济前景的判断和对大战所致风险的担忧,德国人不至于认为大战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佳手段,他们仍可能因如下逻辑而走向大战:鉴于敌人在不久后变得更强大时很可能更敢于诉诸武力,从而使和平的经济交往不可延续,并使德国付出巨大代价,为了维护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基本利益,“及时”打一场大战也许好于坐等敌人来犯,至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在此背景下,鉴于军事胜利有助于攫取境外经济资源,也有助于缓解和平的军事竞赛带来的税负增加和资本短缺加剧等问题,大战的经济可取性似乎也会上升。该逻辑可能或很可能是历史的真实。但即便如此,上述逻辑仍是以对国家间军力对比变化的担心和对预防性战争的倾向性为前提;换言之,预防性战争动机仍更可能是推动德国走向大战的决定因素。总之,如果没有预防性战争压力,难以想象德国人也将迟早发动一场基于经济需求的大战;以国家生存、自主和荣誉为核心的“政治—军事安全”考虑应是促成德国在1914年的战争决定的根本动因。

^① 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 30-31; Martin Kit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p. 238.

^② Geoff Eley,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Marilyn Coetzee, *The German Army League: Popular Nationalism in Wilhelmine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Wolfgang Mommsen,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Wilhelmine Germany, 1897-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4, No. 4, 1991.